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刘小枫 主编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天主教 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德] 席林 著
顾仁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刘小枫 主编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天主教 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德] 席林 著
顾仁明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德]席林著;顾仁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朗朗书房·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ISBN 7-300-04951-6/B·306

I.天…

II.①席…②顾…

III.罗马公教-基督教伦理学

IV.B9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875 号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刘小枫 主编)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德]席林著;顾仁明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2.875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6 000

定 价 19.9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历史地观之,基督教有社会 and 思想两个层面。前者指基督教会的形成及在诸民族社会中的传入和发展过程;后者为基督信仰在神学、哲学、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性历史表达。基督教的社会层面和思想层面尽管相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

基督教思想形成于公元最初三百年,其时有希腊语思想者和拉丁语思想者(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借希腊化哲学思想和罗马哲学思想,表达对基督事件之认信,开基督思想之先河。在中世纪,基督思想在拉丁语文化中与古希腊思想再度融糅,形成欧洲中古思想之主流。近代以来,基督新教随宗教改革而衍生,民族国家形成,基督思想遂与欧洲诸民族语言文化融糅,形成风貌各异之基督思想。俄罗斯则直承早期希腊语基督思想,形成独特的俄语基督思想(东正教思想)。近百年来,随着肇始于欧洲之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基督思想亦植入亚洲,产生汉语、韩语、日语之基督思想。

语言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质超逾民族性,形态却假依于民族语言。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语言的思想个性。基督思想历近两千年语程,迄今仍在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结构要素。

翻译乃民族文化拓展之良履,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



苦其不足。”中国学界百年翻译之业为汉语思想走出自我封闭，拓展自身开辟了途径。20世纪40年代，美国神学家、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中国神学家谢扶雅教授等共同从事，至60年代已成32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思想典籍的汉译事业，令学术界感佩。同时，《集成》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如人意；对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思想学典顾及不足。最令人遗憾的是，《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终。

本文库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思想学典未尽之业，以补汉译泰西学术中移译基督教思想学典之不足。文库定名为“历代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2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表明仅涉及基督教的思想史文献，旨在积累历代基督教思想的汉语学术典藏。

本文库以翻译为主，但亦收汉语基督思想文典。

I.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含希腊语早期基督思想、中古拉丁语基督思想。

II. 现代系列（从16世纪至20世纪）。含近代西方各民族语言之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基督思想学典；此两系列亦包括犹太教思想学典和汉语基督思想文献。

III. 研究系列。为现当代中西学者对历代基督思想具学术深度之研究著述。百余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中国思想学术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在欧洲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影响下逐渐形成和扩展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种实证知识性的思想原则和



相应的知识学方法构成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大学和研究机构,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现代学术(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以知识学的原则和方法检审历史和现实中的思想和社会,尽可能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地研究人类的意识理念和生活样态。在这种学术形态中,基督教神学作为一种传统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督教思想及学术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为其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思想及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

文库之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汉语思想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汉语学术思想值现代转型重铸之际,文库愿益于汉语思想之丰硕,不负汉语学术之来者。

中译本导言

一、天主教的社会理论和德国经济伦理学

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并非如一些人想像的那样美好。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人类面对着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自然环境的持续毁坏、人口爆炸、饥饿和贫困、扩军备战以及长期失业等等。这些问题使许多人,特别是道德敏感人士深为不安,他们要求在解决这些问题和危机时更多地诉诸道德和伦理。此外,由于经济因素在这些问题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从而,人们对于经济伦理学寄予了特别的期望。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德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应运而生。尤其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经济伦理学几乎成为德国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相关的学术活动不胜枚举,出版物令人目不暇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批判对象的(大)企业积极主动,促进了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的发展;与此相反,更多地看到整个经济关系的各政党、公共咨询机构、国际性组织则对经济伦理学持保留态度。但是,这里的一个例外则是各大教会。他们通过会议、对话纲要和公开表态,主导性地参与了包括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在内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例如,1991年就公布了两份重要的教会公告:教皇保罗二世(Johannes Paul II)的社会



通谕《百年》(Centesimus annus)和德国新教(EKO)的备忘录《公益和自利》(Gemeinwohl und Eigennutz)。

对于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人们常常说“经济伦理学的复兴”、“经济伦理学的再发现”等等,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正如梅兰(Josef Meran)所说:“如果人们注意到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大量科学文献,即自19世纪中期以来基督教社会伦理学持续地积累起来的文献,人们肯定就不能说什么经济伦理学的再发现了。”[H. Lenk: *Wirtschaft und Ethik*《经济和伦理》,M. Maring 编,Stuttgart,1992,50 页]事实确实如此。人们只要回顾一下,自那时起天主教会关于经济伦理问题所发表的大量文献,不仅列举了道德-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2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宗教的规范,而且也发挥了关于社会生活的部分形而上学的、部分经验性的理论,即天主教的社会理论,天主教的经济伦理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时,就可确信这绝非虚言。

关于天主教社会理论的定义,克尔伯(Walter Kerber)是这么理解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所有出于天主教信仰的关于建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论述,都可以被概括为‘天主教的社会理论’。狭义地理解,它只是那些由天主教神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阐述的伦理结论。而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它仅指教皇和主教有关社会问题的正式公告。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教皇的‘社会通谕’,即概括其原则内容的正式的世界通告。”[G. Enderle 等编: *Lexikon der Wirtschaftsethik*《经济伦理学大辞典》,Freiburg, 1993, 484 页]

如果这样理解天主教的社会理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对于天



主教徒个人来说,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天主教社会理论产生于对天主教徒灵魂关怀的必要性,是对其社会行为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帮助。在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中,尤其是在一个持续和迅速变迁的世界中,把基督启示的信息恰当地转换成行为的有效准则,对于想按其信仰生活的个人来说,这个要求太高了,因此就要求教会共同体做一种译转的工作,发挥一种包括经济伦理学在内的天主教社会理论。

从社会背景的角度来看,19世纪的整个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中心的“社会问题”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着道德上的真正不公。这种不公不能归结为个别人直接的人格缺陷,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有其根源;它难以由个人加以克服,而只有通过共同的责任才能加以改变。对此,天主教会认为:为了给经济和社会的责任指出合适的道德准则,传统的道德诫命是不够的。这样,为使信徒意识到新的义务,教会组织的天主教社会理论就应运而生了,它实际上是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基督信息的阐述。

从经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以下几个原则上充分体现出来:(一)人格尊严。根据天主教社会理论的最高原则,人必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承担者、创立者和目的。(二)团结互助。由于基督教的博爱命令,天主教社会理论根本不同于各种“生存竞争”的社会理论,她把团结互助看做不仅是个人、群体,而且是整个人类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三)独立自主。共同责任并不排除,而是要求任何个人和群体首先有义务和权利独立地处理自己的事务。独立自主原则既拒绝中央集权,但也要求一切不能由个人和较小的共同体单独解决的事务中的共同

责任。(四)私有制和竞争。天主教社会理论始终捍卫私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但要求公正的分配。同样,天主教会也承认竞争对使私利为公众服务和提供为居民所需求的产品的意义。

从天主教经济伦理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社会理论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文献中特别重要的是:(一)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的第一个社会通谕《新事物》(*Rerum novarum*)。这一通谕主张以工人、雇主和国家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为基础,通过改革社会关系以解决工人问题。在工人的权利方面,《新事物》通谕要求防止过高的劳动要求、要求礼拜天休息、能满足家庭需求的“公正的”工资和结社自由。(二)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4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Pius XI)的社会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这一通谕所关注的对象已从工人问题转到整个社会的秩序问题:国家应使财产既为个人利益也为公共福利服务;竞争应纳入体现社会公正的法律和社会秩序,资本不能片面地利用雇佣劳动,而不考虑工人的人格尊严和公共福利。(三)1961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的社会通谕《慈母与导师》(*Mater et Magistra*)首次探讨了南北问题;在经济事务中强调个人主动性优先于国家行为;支持雇员的共同决定权和财产的分散化。(四)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的《幸福与希望》(*Gaudium et spes*)要求在经济中尊重和促进人格尊严;指出经济的目的既不是更多的生产本身,也不是赢利和权力,而是为整个人类服务;劳动优先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其他要素;财产权及其使用要考虑整个人



类的利益。(五)1991年教皇保罗二世的社会通谕《百年》比以前更多地肯定了自由企业和市场协调的效率,强调必须把这种自发的力量纳入社会和生态的“确定的法制秩序”,承认工人要求充分尊重其尊严和更多地参与企业生活的努力的合法性。

正是在这一发展背景中,依据教皇的社会通谕确定的基本原则,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德国天主教社会理论家撰写了大量的关于经济伦理学的论著,从神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对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确定了经济行为的规范。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这些论著虽非关于教义的惟一的、毫无差错的阐述;但是,由于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论战性地表明了天主教的立场,以教皇社会通谕为主体的天主教社会理论对天主教徒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约束性,而且通过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理解,从教会的这些论述中获得关于经济行为的可靠准则,成为自己的经济伦理学,以实现在经济生活中的正确选择,而在这些论著中,值得重视的有德国天主教社会理论家席林(Otto Schilling)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二、席林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席林(1874—1956)作为德国天主教神学家,自1916年起任图宾根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 Aquin)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社会理论,撰写《天主教社会伦理学》、《道德神学教本》(两卷)、《社会问题》、《现代经济问题》、《圣托马斯的国家和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与法哲

学》等,发表于1933年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是他的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

就《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社会时代背景而言,虽然此书出版时,正是希特勒开始取得德国政权,建立其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初期,但就它的内容而言,实际上涉及的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至于此书的理论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关于此书的指导思想,正如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是依据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社会通谕《四十年》的原则写成的,或者说是“遵循和发展了”其原则。第二是关于此书的论战特点。1927年,冯施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6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Georg Wünsch) 发表了《新教经济伦理学》(*Evangelische Wirtschaftsethik*),作为天主教社会理论家的席林,当然有必要对此作出反应。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写作方式,或者说其内容结构,则具有明显的教科书特征。《导论》论证了经济伦理学的概念、任务、可能性、原则和源泉等问题。《基础部分》论证了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信仰基础、基本概念和要求及非经济的基本前提问题。这两个部分是此书的理论部分,对于读者了解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国民经济总论》从经济活动的基本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个别经济部门》则从经济活动的基本部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出发论证了天主教经济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应用问题。虽然这里涉及的国民经济具



体状况,在德国早已成为历史,作者对此提出的一些具体看法,也不一定适用于现在的经济现实,但其中所体现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则仍然有效。《经济的主要方向》和《教会在经济领域内的权限和任务》则有某种“总结”和“宣言”的性质。作者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述了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后,表达了坚持“社会有机体制”的信念,确定了教会在经济领域内的权限和任务。针对《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上述特点,以下从“德国天主教的经济伦理观”这一角度着手,概括此书的一些基本论点,并对此做出简要的评价。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和任务,席林认为,为了给人类的生存提供和保障物质资料,人类必须从事经济活动,但是,经济活动不是目的本身;毋宁说,“最终的目的是上帝”,[Otto Schilling: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天主教经济伦理学》,München,1933,5页。(本节除特殊注明外引文均引自此书)]因此,“经济伦理学是对这样的规范进行学术的论述和发挥,它们使经济的所作所为符合满足需求的相应最近目的,并进一步符合最高目的。”那么,经济伦理学是否能够发挥这一功能呢?对此,席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强调:由于经济领域并不存在来自自私自利的不可抗拒、不容变更的规律,从而经济伦理学是可能的;由于经济领域只具有相对的自律,从而经济伦理学是合理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基督教全部伦理学的最终目的和原则是,使人类和上帝——内心永远幸福的对象——相像,因此就是包含上帝之爱和仁爱的仁慈”。

从现代经济主要方向的角度来看,天主教经济伦理学持对经济生活的有机性理解,主张经济的社会有机体制。“对经济生

活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是仁爱,这样就产生了关于经济生活的基督教的有机观点。”即“通过爱的原则和被爱当做最低标准的公正”而形成的经济共同体,是现代惟一能确保秩序与和平的经济方向。这种社会有机体制的特点是:“社会组织体现了一个内在的、由上帝预先确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作为统一的纽带,将从属力量和从属部分或者其成员有效地团结在一起,使它们为整体和为实现整体的目的而服务。”“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方式本身可以和社会有机体协调一致……如果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心中充满了那种体制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体制的精神将把经济生活引入正确的轨道。”

席林认为,和基督教的有机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主要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社会有机体制相对立的主要经济方向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性错误在于:它把国家和社会分割开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它把两者合而为一。当然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压制个体和个性,因为个人和国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这里,席林明确反对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主张经济的社会有机体制:“如果首先要刻画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特点,那么,一开始就必须强调:这并不是对资本经济的经济方式本身进行评判,而是说明与经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对此,席林认为有必要在基督教仁爱原则的指导下,对自由竞争及其供求原则作恰当的限制,恢复健康的



经济生活秩序,消除有害的阶级斗争,关于社会主义,席林认为“社会主义是那种方向,它在限制个体经济和强调共同体经济方面走得太远。”从而,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绝对不是针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仅仅反对资本过度的权力欲,它要求采取有效的国家措施抵制这种财产滥用,它自身不想要阶级斗争,这里的批评只支持和同意阶级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能够和应该导致社会的和平以及阶层之间的和睦合作。”

正是基于社会有机体制的原则,席林最后论证了天主教会在经济领域内的权限和任务:在社会伦理和经济伦理领域内,教会“被委托和授权对一切和道德准则有关的事物进行裁决。”“教会也被授权,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进行裁决……一旦涉及美德的问题,那么,最终的裁决属于教会。”从而,面对当时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席林强调:“教会必须拯救人类,因此必须向人类宣告在所有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上的真理,并对‘什么是应该的’作权威性的说明。”此外,“教会不可以只满足于教导,她同时必须——只要在她的权力范围内——使由她宣布的理论和思想变为现实,并对此进行引导和做出贡献。”至于完成教会在经济领域内任务的基本途径,就是倡导社会基督教运动。

三、德国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新发展

从德国天主教经济伦理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已是一种历史文献了,它所面对的问题已为当代德国经济生活的现实所超越了。但是,就《天

主教经济伦理学》一书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而言,或者就其所体现的天主教的经济伦理观而言,它并未过时,关于这一点,可以现代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奠基者和长期执行者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论述为证。

在总结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成功经验时,艾哈德说:“联邦德国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于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L.Erhard: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来自竞争的繁荣》,北京,1994,8页]这条健全的

历 代 基 督 教 经 典 思 想 文 库 10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

中间道路,是否就直接是席林倡导的社会有机体制的经济发展方向呢?这是可以探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席林的经济伦理观在现代德国的经济制度中是有所体现的。这里即使不考虑艾哈德本人的信仰背景,[艾哈德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和所有孩子是新教徒。参阅 V. Laitenberger: *Ludwig Erhard-Der Nationalökonom als Politiker*《路德维希·艾哈德——国民经济学家作为政治家》,Göttingen,1986,10~11页]也应该承认这一点。

实际上,正如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上的含义一样,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其特殊的经济伦理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的道德基础上。这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第一层次的自由,经济自由是第二层次的自由。与经济自由相对应,有社会国家性原则



和私有财产的明确的社会义务原则，包括国家的社会义务和个人的社会义务两个方面。简要地说，可以把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伦理观或道德框架概括为：基本上的个人自由，明确的社会义务。

当然，德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相结合的经济伦理观成为现实，绝非轻而易举。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汲取了本国和其他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才选择了比较符合国情和民意的经济制度，从而造成了今日德国经济的发达和人民生活的富裕。这里，大多数公民对“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相结合的经济伦理观的认同，也是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在这一先决条件中，同样包括着早就由席林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一书所发挥的天主教经济伦理观的作用。由此可见，在现代德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天主教的经济伦理观是必要的和积极的前提之一。

当然，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问题，不仅远不同于席林时代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远不同于艾哈德时代的问题（战后德国经济的重建和复兴），而是近几十年来，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德国建成“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生态和心理问题。正是面对新的时代问题的挑战，德国天主教会及其理论家在持续关注经济伦理问题的基础上，自80年代以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做出了不可或缺贡献。

例如，德国天主教罗滕堡-斯图加特（Rottenburg-Stuttgart）主教管区科学院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组织了多次“经济和伦理”的讨论会，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经济伦理学